生态美

□陈仓

前往九江的路上,我一直仔细地琢磨着,在这里谈论生态文学,到底应该谈论什么呢?其实,我是第一次来九江,我和九江之间曾有一段感情,那段感情之所以回忆起来如此美好,因为那段感情是原生态的。

据资料显示,九江应该是田园诗的发祥地,是山水诗的发源地,田园诗和山水诗的核心,歌咏的其实就是生态美。我一踏上这片土地就发现,经过岁月的清洗和时光的淘汰,我依然可以背诵的几首诗,大多数和九江有关,比如苏轼的“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比如李白的“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比如白居易的“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

这几首诗都是写庐山的,等我真正登上了庐山,发现已经是一梦千年,鸟语、花香、溪流、飞瀑、绿树、芳草,诗人们所描述的“时时闻鸟语,处处是泉声”的情境依然存在,让我们体会到了生活在古诗词里的那种美妙。所以,我认为生态文学真正的价值,其实并不在文字表面,也不在各种各样的修辞,而是原生态地存在于绿水青山之中。

比如无论投宿何处,窗外总有一群鸟儿,它们没有什么文字,但是它们叫成一片的时候,我发现天就亮了,太阳就出来了,有一股生气扑面而来;比如漫步在庐山之上,发现总有一棵棵树,它们也不懂任何修辞,但是它们随着风轻轻摇晃,便长出了一树的叶子,有些树还开出了一树的花,就能感受到它们的美涤荡人心。

自然美,也就是生态美,在九江是处处可见可感的。比如第一天晚上住在濂溪区,大家吃完了晚饭去院子里散步,发现宽阔的草坪上亮晶晶一片。你如果不仔细辨别,会以为是散落在草丛中的钻石。我弯腰去捡,不想却打湿了我的手,顿时有一种破碎的清凉袭遍全身。

原来是刚刚下过了雨,虽然雨过天晴,但是密密麻麻的露水仍然依依不舍地停留在草尖,或者说是每一根草都紧紧地抱着一颗钻石。在这样的大地上漫步,是柔软的,是轻松的,更是清新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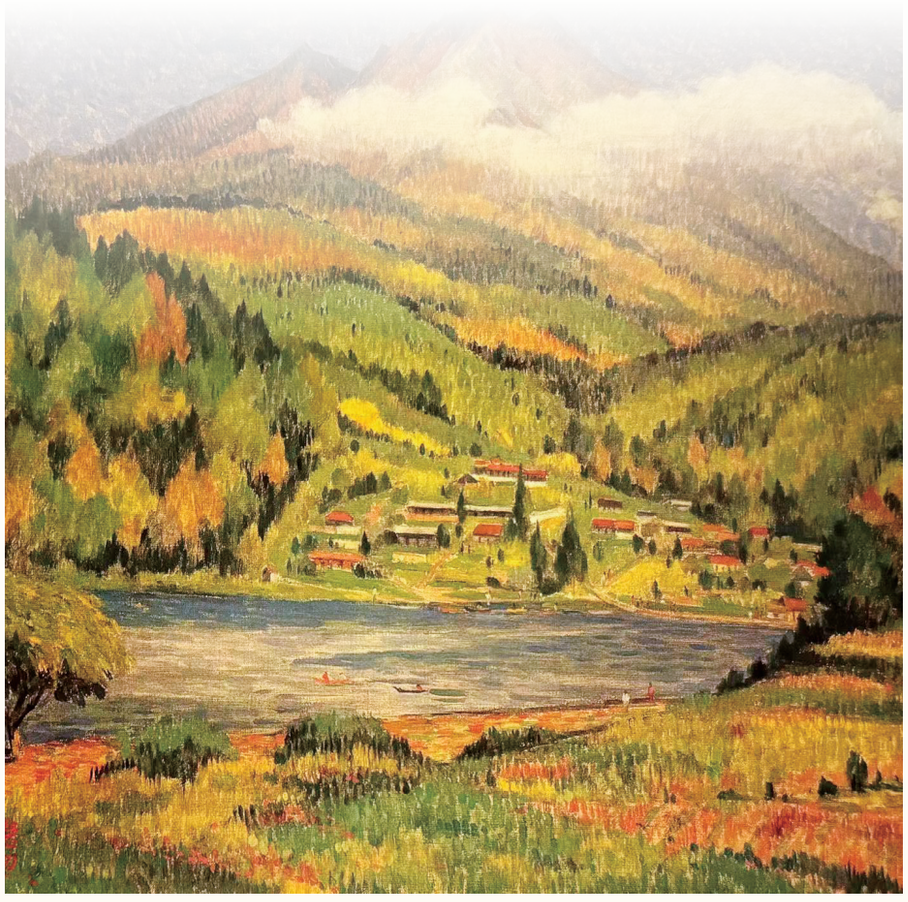
如果顺着露水反射出来的光亮抬起头看看天空,你会发现一轮毛茸茸的、湿漉漉的月亮,正在把大地上不忍离去的每一滴露水点亮,或者说是每一滴不忍离去的露水都抱着一个月亮。

再走几步,会遇到一块告示牌,提醒我们会有蛇出没,请大家注意防范。我并未因此感到恐惧,反而有一种好奇,因为蛇出没的地方,是有灵气的,甚至是有仙气的。在这样的背景下,谈论生态文学或者文学生态的时候,我会自然而然地想到自己的家乡。

我的家乡是陕西秦岭山中的一个自然村落,我们村子里的人,尤其是我的父辈,大多数是文盲,村子里没有任何工业,现在还不通班车,至今没有4G信号,完全过着一种原生态的生活。

不像“九派寻阳郡,分明似画图”的九江,有庐山,1500余位文人墨客争相登临;有修水,出了诗书双绝的黄庭坚和陈寅恪这样的大师;有西海,那里大大小小的岛有8000多个。在九江,名人故居、摩崖石刻、千年古街,可谓是星罗棋布。

而我们那里,没有任何能够代表文化的东西,唯一有点文化的只有最近几年才兴起的墓碑。不过,墓碑上没有墓志铭,没有标注身份地位,只有名字和生卒年月。即使如此,我们常去祭拜自己死去的亲人,也不管这些亲人有没有保佑我们的法力。



揽胜(油画) 周碧初 作

当然,我们更多的时候,是去拜自然界的一座山、一块石头和一棵树。比如,我的表弟把他家门前的一块巨石认成了干爹,我的外甥女把寺庙门口的一棵柏树认成了干妈,逢年过节要去祭拜,以求它们保佑自己平平安安;比如,我们普遍把村子里的一棵松树当成了神,这棵松树长在我家背后的悬崖上,它是我们村子里最大的一棵树,之所以活得如此之久,可能因为是一棵歪脖子树,不能当梁做柱,也不能劈柴烧火。

我们那里有一条河,很小,没有名字,所以长不出大鱼,但是我们喜欢到河里摸鱼,从石板底下摸到小鱼秧子以后,我们并不拿回家烧汤吃肉,而是在河边挖一个水坑,把鱼放在水坑里养上几天,最后再把它们一一放生。当时,我常常要饿肚子,吃了上顿无下顿。我一直想不明白,我们吃树皮草根,吃糠喝粥,但是为什么不吃鱼呢?

在修水,我重复了一次类似的游戏,那是夜游修河的时候,在迷离的夜色中,有几条鱼纵身一跃,竟然跳上了我们的船。也许,鱼儿被人们欢乐的气氛所感染,想体验一下划着船穿过修河的生活。

这多像人鱼之间的“濠梁之辩”——人们羡慕鱼儿能自由自在地游弋在水中,而鱼儿却羡慕着人们能悠闲地荡着轻舟。但是,鱼儿万万没有想到,离开水的日子并不好过。它们在船板上舞蹈着,或者说是苦苦地挣扎着,像星星一样一闪一闪地发出了银色的光芒。我们见到活蹦乱跳的鱼儿,首先想到的并不是如何去吃它们,也不是嫌弃它们太小了,而是它们生活的河水那么清澈,让我们体会到了它们离开水之后的难过。

因为有了小时候的经历,我赶紧提议将它们放生。我的提议得到了大家的认同,有人就小心翼翼地逮住它们,把它们放回了清清凌凌的河中。直到下船的时候,有人还担心地问:“它们游走了吧?”有人就回答:“它们欢快地游走了。”

我们老家那里不吃鱼,其实也不吃狗和蛇,后来我问过大人,大人告诉我,狗可以看到人的魂,蛇属于祥瑞之物,所以不能随便屠杀。至于鱼,大人没有说出所以然,我估计是因为我们那里的河水,都是从石头缝里憋出来的,这些鱼不知道从何而来,也不知道去了何方,反正冬天河水一干,它们就不见了,春天河水一涨,它们又冒出来了,所以总觉得这些自然的东西都是上天派来的。

我过去总以为,我们的村子是没有文化的,甚至是没有信仰的。但是慢慢地我就不再这么认为了,我认为我们拜山拜树拜石头,不吃鱼不吃蛇不吃狗,而且放生鱼敬畏蛇善待狗,这就是我们的生态观,也是我们的价值观,通俗地说就叫作信仰。

我们的信仰和审美一样,是“天然”地存在于生态环境之中的。我查了一下“天然”的定义,意思是“不经人力干预”,而文化恰恰就是人类干预世界所积累下来的。我认为,神、佛或者仙,只会在僻静的地方降临,或者说是在天然的地方降临,因为神、佛或者仙本身就是天然的,是带着天意的,它们降临的时候是不能受到任何干扰的。

正因为我们村,方圆的山山水水,还有生活在那片土地上的父老乡亲,完全处于一种天然的状态,所以看似没有神、佛或者仙,其实神、佛或者仙是天然存在于一枝一叶一山一水之中的。看似是没有文化和信仰的,其实文化和信仰是天然存在于人间烟火之中的。

我又想到了我的小说成名作《父亲进城》,当时,我带着我的父亲。父亲是文盲,他没有在城里过过夜,也没有使用过手机这样的产品,他可以说是一个原生态的人。我带他参观博物馆的时候,我看到一个金碗就告诉他,金碗是唐朝的,如今价值三千万,父亲却说:“再值钱能用来吃饭吗?不能用来吃饭那还叫碗吗?”登东方明珠的时候,我炫耀地告诉他,东方明珠有多么多么高,父亲却说:“再高有我们家的山高吗?”我带他去看海,我说海大吧?我告诉他,他的洗脸水,他流的泪水,还有门前无名小河里的水,顺着丹江、汉江、长江,当然还要经过九江,这么一路流下来,终于流到了海里。父亲说,海再大,也是从我们那里流过来的。

你可以说我的父亲没有文化,也可以说我的父亲没有见识,但是他的话还原了万事万物的本质,因为他像一只鸟一棵树一样,他的经历、他的想法、他的目光、他说的话,没有任何改造,没有任何雕琢,没有任何粉饰,都是原生态的存在。而我们这些受过现代文明洗礼的所谓的文化人,多数时候对万事万物的定义,其实是被改造过的,甚至是被扭曲过的,已经偏离了万事万物的本质。我们很多时候所用的修辞,都是通过所谓的技术,或者说是固有的审美理论,对世界进行的某种程度的曲解。

总之,生态文学、文学生态,是相辅相成的,需要运用原生态的表现手法,反映一个原生态的世界。我总是强调,优秀的文学作品,不是写出来的,而是活出来的,尤其是生态文学创作更需要如此。在“江西生态文学周”期间,生态环境部宣传教育司与中国作家协会社会联络部联合发布了2024年度生态文学推荐书目,包括阿来的《去有风的旷野》等生态文学作品。这些优秀的生态文学作家为了观察一条河一只鸟一朵花,可以在野外生活几个月,蹲守几个通宵,这样的作品其实就是活出来的。

明朝陈继儒在《太平清话》中列出了二十四种文人的雅趣,其实就是和自然生态通灵的方法:焚香、候月、听雨、浇花、经行、晏坐、翻经、看山、喂鹤……这都是在营造一种氛围,让我们进入一种自然的状态。我觉得生态文学创作的写作就是“本色出演”,就是“原生态呈现”,就是正在通灵的一种过程。

灵,当然是灵魂的灵,神灵的灵,灵气的灵。这是天地人三界之中,通行无阻的一种物质,是人和自然通用的一种语言。生态和文学,生态文学和读者,不都是通灵的关系吗?不都是一个通灵的过程吗?

这样的体验是AI永远无法替代的,因为AI生来是一个残疾的孩子,它不瞎,可以看到颜色;它不聋,可以听到声音;它不哑,可以用嘴巴说话。但是它没有嗅觉和味觉,闻不到世界的气息,尝不到生活的味道。

来碗热干面

□余坦坦

我把吃——吃热干面,摆在我喜欢武汉的诸多理由之首,似乎正应了那句古语——“民以食为天”。

的确,“吃”在咱中国人的生活中占据着首席之位,所以被称为“天”。这更体现在百姓的日常言行中,比如大家见面打招呼最常用的问候语就是“吃了吗”,尽管见面的时间与场合常常与吃毫不沾边,有时甚至是在公共厕所里,或者是刚刚从厕所里出来,但这并不妨碍人们仍然这么问候。

“吃了吗”这句话有时候确实是问你吃饭了没有,但更多的时候和场合其实只是用来打个招呼,没有“吃”的涵义在里面,这一点是很让外地人甚至是外国人困惑与不可理解的。“吃了吗”用武汉话来说就是“吃了有(mào)”,前两个字相同,后一个“吗”字变成了个“有”字,两字声母相同,但语义则完全不同。“有”算是武汉话中特有的一个字了,是“没”或“没有”的意思,因此“吃了有”翻译成普通话就是“吃了没”或“吃了没有”的问话。这是第一个区别——语义上的区别。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区别,就是语音上的区别。武汉话中“吃”不念阴平声的“chī”,而念汉语拼音中的第三声上声“qǐ”。许多初听武汉话的人应该听不懂“qǐ”(吃)这个字,就好比我初到湖北襄阳时听到当地人把鞋子(xiézi)念成“hái zi”——武汉人也是这么说的,心想鞋子怎么成了“孩子”呢?这就是方言的有趣之处。武汉话中还有许多有趣的东西可以讲,武汉话其实也是我喜欢武汉的理由之一,但因为这一篇的主题是热干面,所以就不展开讲了。

还是言归正传,“言”热干面。

吃了这么多年的热干面,可真要我说说它的来龙去脉,还真说不来,只知道个大概。好在现在上网方便,随便一搜就搜得出来。

说是热干面源于20世纪30年代初期,汉口长堤街卖汤面的黄陂蔡榨人蔡明纬。他的汤面做得非常受欢迎,客人经常排队要等很长时间,很多客人等不及走掉了。由此,蔡明纬摸索出一套“掸面”的工艺——先把面煮七八成熟,然后快速降温并均匀抹上油,这样卖面时出货量就快了。后又将芝麻酱加进面里,身边的人都说好吃。热干面——这个武汉人民最爱的小吃就这样诞生了。

热干面现在是武汉最出名的小吃,网上说它是“武汉最出名的小吃之一”,但我把“之一”给删掉了,因为它就是“最”,不是“之一”。如今的热干面与兰州拉面、山西刀削面、四川担担面、河南烩面并称“中国五大名面”。有一年我去伦敦,在唐人街上看到“中国五大名面”的招牌,其中赫然就有热干面。可见热干面不仅“吃”在中国,也“吃”到了世界。

那热干面为什么就能力压群“吃”那么“火”呢?

我不做餐饮,也不懂餐饮,因此无法从烹饪技艺的层面来回答这个问题,我只是从一个食客的角度来解释一下热干面“火”,确切地说是它普及并为大众喜闻乐“吃”的原因。

首先是吃起来简单。所谓“吃起来简单”,又包含两个方面的“简单”:一是食材简单——就是面,加上卤水汁、芝麻酱、食油、辣椒油、葱、蒜、萝卜丁、酸豆角、酱油、醋等辅料佐料。其中卤水汁、芝麻酱、食油、酱油甚至醋都是给你添好了的,不需你手劳,你需要取舍的就是葱、蒜、萝卜丁、酸豆角这几样,这几样完全根据各人口味予取予舍。再就是“端”得简单。所谓“端”得简单,就是热干面是“干”的面,几乎没有汤水,因此你端起来就可以走,不用担心像汤面那样会有汤水泼出来,而且可以一边走一边吃。以前武汉早上的一大风景就是许多人一边匆匆赶路上班,一边手里还端着碗热干面大吃特吃,走路吃饭两不误。当然现在建设“文明城市”,这种“风景”已经很少能看到了,就像现在有了空调,就再也难见竹床阵一样。

其次是做起来简单。我是个舞文弄墨的,但只要我愿意,我明天说不定就可以搭个棚子、支个炉子卖起热干面。因为制作热干面的设施确实是忒简单了,唯一考验人的,估计就是身体和作息了——需要身体好也需要早起。仅此而已吧!当然味道是不是正宗是不是好,那就另当别论了,要做好肯定要积累经验。

第三是便宜。记得20世纪70、80年代,热干面一碗只卖一两毛钱,90年代涨到大概大几角、块把钱一碗吧,现在大概四五块钱一碗。前几年汉口万松园一带的雪松路美食街热干面创新,推出“蟹脚热干面”,76块钱一大碗,相当于一盘大菜,可以供几个人吃。但总的来讲热干面依然是价廉物美的大众食品,较拉面、刀削面、担担面、烩面甚至襄阳牛肉面等其他面食,仍然是最便宜的。一个便宜三个爱,何况味道还这么好,焉有不大卖之理!

我第一次吃热干面,记得是1974年的冬天。那一年我们全家回安徽老家,顺便沿长江旅游:从襄阳到武汉,再坐“东方红”号客轮到南京、上海。我就是在途经武汉时第一次吃的热干面。

当时我父母都是现役军人,按照当时部队的规定,我们一家可以免费住部队的招待所。当时中山大道与民生路交会的地方有个部队招待所,离那不远的地方,也就是老亨达利钟表商店的对面,就有一家“蔡林记”热干面馆。几步之遥,我就是在这里吃了我人生的第一餐热干面。这一碗热干面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因为我从来没有吃过这样的面,确切地说,是这样干的面。我出生在山西大同,山西人喜欢吃面,我自然也不例外,但山西的面,包括后来在襄阳吃的面,都是有汤有水的,可这碗面却一点水也没有,干涩干涩的,还有点麻口,但因为加了芝麻酱、香麻油等而回香无穷。以至于离开武汉的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在回味它那种干涩麻口但回香无穷的味道。不过从那以后,再没吃上热干面,直到1981年我来武汉读书工作。

热干面虽然是传统小吃,但也并非一成不变,总有商家因为想卖出新意而常常思变。近年来热干面最著名的一大“变”,就是前面提到的“蟹脚热干面”,它一经推出即成爆款。每有外地朋友来汉想吃热干面,我总是推荐他们去那儿,也带人去吃过几次。然而“蟹脚热干面”虽然好吃,但终究不是普通消费,只是作为热干面中的“极品”,偶尔尝尝可以。

关于热干面,我就先讲这么多吧。有些与热干面有关,有些看似与热干面无关,但其实与热干面还是有关。因为热干面已经不仅是一款美食,更是一种文化——汉派文化,它尤其是武汉这座现代宜居城市里市民生活的直接产物,有着深深的市民印记。吃热干面,何尝不是一种享受呢?

外地的游人来到武汉,无论是在繁华的闹市,还是在偏僻的里巷,都请记得找一家小店。记得哦,一定是一家小店!然后坐下来,来一碗热干面,最好再配上一碗蛋酒,然后,一筷一筷慢慢地嗦,一口一口慢慢地咽,这一嗦一咽之中,你就尝到了地地道道的“武汉味”。

唐兆子与拍鸟

□易伟

神农架已发现鸟类470余种,约占湖北省总鸟种数的80%,占全国总鸟种数的30%以上。全国各地的拍鸟爱好者,很多专程来神农架拍鸟。在这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里,我也一直专注神农架鸟类的拍摄。而拍鸟的兴致,却缘于武汉大学动物标本制作大师唐兆子。

十多年前,唐兆子被聘为神农架自然展览馆专家,而我是展览馆的义工。唐兆子没有一丝半点的大师派头,每次见到,他总是亲切地叫我的名字,谦逊地点着头、弯下腰、伸出右手晃动着,表示问候。

和唐兆子一起时间久了,得知他祖籍福建,祖辈是个猎户。到了曾祖父的时候,一个英国传教士教他制作动物标本。从那以后,制作野生动物标本的技艺也就在唐氏后代一代一代地传了下来。

身怀制作动物标本技艺的唐兆子祖父,看到武汉这个商贾云集之地的商机,于1920年来到武汉,专门制作各种动物标本谋生。1928年,唐兆子的父亲也从福建来到了武汉,协助其父。1929年,唐兆子的祖父和父亲都被武汉大学聘请去制作野生动物标本。等到唐兆子在制作出的野生动物标本上烙上“标本唐”印记时,他已经是第四代动物标本制作传人了。

唐兆子还告诉我:1977年3月至11月,他参加了160多人组成的神农架“野人”考察队。他在坪阡发现了特别多的红腹锦鸡、雉鸡。更让他感到惊奇的是,在大九湖,他发现了一群栗树鸭!

大九湖,海拔1700多米,四周被山峰包围着,一条山溪连串着九个沼泽湖泊而得名,面积3万多亩。5月份唐兆子他们来到这里。一天傍晚,唐兆子看见天上一朵朵白云被落日的光芒映照得金黄金黄,就连沼泽地里的小湖泊也映出一块块的金黄。远处山腰缠绕着薄雾,与草地上白色羊、黑色的猪、黄色的牛组成了一幅完美的大九湖晚霞图。

突然,一群从西边落日的远方飞来的鸟,披着金黄色的霞光,从唐兆子的头上掠过,直接落到大九湖特产场后面的大树上。原来这是一群栗树鸭,是从沼泽地里飞过来落在大树上栖息的。

30多年过去了,唐兆子回忆起那晚的情景时仍然兴奋不已。他激动地对我说:“栗树鸭属中小型鸭类,体重500—600克,体长40厘米左右。上体主要为黑褐色,尾上覆羽、下胸和腹栗色,外形似鹅。在中国主要在南方繁殖,一般不作长距离迁徙。在长江中下游地区为夏候;在云南、广西、广东和福建地区部分为留鸟,部分为夏候鸟和冬候鸟;在海南岛为留鸟,台湾为迷鸟。怎么出现在大九湖沼泽地里,让人疑惑不解。”

“神农架有很多自然界无法解释的‘谜团’,作为神农架人,你有义不容辞解开这些‘谜团’的责任!从小处说,你所做的这些事,是对神农架有益的事;从大处说,这都是对自然界、对人类有益的事!”唐兆子言语间充满了深情。

我久久地看着他,认真地说:“唐老师,您说得很对!”

“叽咦、叽咦”,传来几声很尖细的叫声,唐兆子赶忙提醒我:“听到了吗?这是蓝喉太阳鸟的叫声。”他指着几株高山杜鹃树又说:“一会儿,蓝喉太阳鸟就会到高山杜鹃花上来采食花粉。这种太阳鸟喜食花蜜,体态轻盈、飞行技术高,能悬停在空中吸食花蜜,羽色非常漂亮。它们在采食花蜜的过程中,其羽、喙、足会沾上花粉,通过采食另外的花朵便会将花粉传播到另外的植株花朵上。”

突然,一只比拇指稍大、喙细长下弯的小鸟“叽咦、叽咦”地鸣叫着,落在大杜鹃树的花朵上。它头顶深暗,喉至胸灰绿色,上体橄榄绿色,腰黄色,下体则泛着绿黄色——它正忙不迭地吸食花蜜。唐兆子连忙指给我看:“快看,蓝喉太阳鸟雌鸟!”那鸟却似羞于见人,迅速跳进树丛深处的枝干,寻找到新的花朵,立马把细长的喙探入花蕊里。

唐兆子赶忙拿出手机,慢慢地往杜鹃花树旁走,准备拍摄花蕊上的蓝喉太阳鸟。

我紧跟着问:“唐老师,手机就能拍出树丛中那么小的蓝喉太阳鸟吗?”

唐兆子双手握着手机,凝视屏幕,对我说:“我只要记录下来就行了,到时候向动物界的同仁们展示蓝喉太阳鸟在吸食神农架高山杜鹃树花蕊的场景。”他提醒我,“你声音小一点,一会儿雄鸟还要来的!”

我慢慢走到唐兆子身边,看着他手机屏幕上,树枝把杜鹃花蕊上的鸟遮挡得已经看不出是完整的蓝喉太阳鸟了。

“唐老师,您这样拍摄行吗?”我在唐兆子耳边轻声问。

“拍了总比不拍好,有个影子比什么都没有要好!”唐兆子凝视着手机屏幕回答。突然,他扭过头,望着我,认真地说,“你不是带有照相机吗?用你的照相机拍摄,怎么也比我手机拍得好呀!你赶快去把照相机拿来,雄鸟来了好拍摄!”

我立即跑步到住地拿来照相机。唐兆子指着那株离我不足2米远的高山杜鹃说:“你去拿相机的时候,蓝喉太阳鸟雄鸟就飞到高山杜鹃花上吸食花蕊。再等等,它们还要来的!”边说边翻开手机上的图片让我看。

静静地等了一会儿,唐兆子突然指着山上说:“听,蓝喉太阳鸟在山上叫了,马上就要飞来了,做好准备!”

果不其然,一对蓝喉太阳鸟“叽咦、叽咦”叫着,从空中飞下来,落到了高山杜鹃树枝上。停了一会儿,又跳到盛开着的白色杜鹃花上去吸食花蕊。我对着蓝喉太阳鸟所在的树枝、花蕊不停地狂拍。

吸食一阵花蕊后,蓝喉太阳鸟飞到山上去了。我在高山杜鹃树旁边等着,学着唐兆子用耳朵听远处山上的鸟叫声。

后来我发现,只要听到“叽咦、叽咦”的叫声,要不了多久,雌鸟就先飞过来了。在花上吸食一会儿,再“叽咦、叽咦”叫几声,雄鸟立马也飞过来了。

我第一次看到,也是第一次用相机拍摄到鲜艳的蓝喉太阳鸟雄鸟站在树枝上、杜鹃花蕊上、悬停在空中吸食花蕊,甚至朝着我飞翔的姿态都拍摄到了。那一天的太阳也特别给力,蓝喉太阳鸟雄鸟细长而向下弯曲的嘴,前额至头顶、颏和喉辉紫蓝色,背、胸、头侧、颈侧朱红色,耳后和胸侧紫蓝色斑,黄色的腰和腹,中央尾羽延长的紫色……在每一幅照片上,特征都十分明显。

唐兆子看到电脑上的图片后,啧啧称赞,他激动地说:“你要这样长期坚持拍摄下去,你一定会成为神农架的鸟类拍摄专家的!”然后又自言自语,“神农架已经发现的鸟类有350多种,隶属16目、48科、158属,大多数为留鸟、夏候鸟,还有冬候鸟和旅鸟。我们现在所在的神农架自然展览馆,我只看到了几十种鸟类。你要是都把它们拍摄下来了,特别是候鸟和旅鸟停留的时候拍摄下来,那对神农架就是一个了不起的贡献!”

“我只会摄影,拍摄的鸟识别不了怎么办?”我问。

“你传给我,只要我不出门,保证24小时内鉴别出来告诉你!如果我鉴别不出来,那我就找全国知名的鸟类专家来为你鉴别。”唐兆子说到这儿,脸上掠过一丝自豪,随即不疾不徐地继续说道,“那说明你拍摄到了神农架新鸟种,那真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我一定等着这一天,等着这个时刻的到来!”

我笑着对唐兆子说:“唐老师,您就不怕我让您失望!”

“你一定不会让我失望,更不会让神农架失望的!”说完,唐兆子和我击掌为盟。

唐兆子已离开我们多年,虽无法再为我鉴定新鸟种,但我始终铭记着我们的约定。十多年来,我拍摄了三百多种、几十万幅神农架野生鸟类图片,还出版了《神农架鸟类图鉴》一书,这或许是我能献予这片山林与故人最朴素的告慰。